

经济学家茶座

合订本

第49—52辑

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馆分会评为“发行优秀畅销品种”
总第五十辑 2010.6

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馆分会评为“发行优秀畅销品种”
总第四十九辑 2010.5

总第五十一辑 2011.1

经济学家茶座

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馆分会评为“发行优秀畅销品种”
总第五十一辑 2011.1

经济学家茶座

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馆分会评为“发行优秀畅销品种”
总第五十二辑 2011.2

经济学家茶座

山东人民出版社



经济学家茶座

合订本

第49—52辑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学家茶座: 合订本. 第49~52辑/金明善主编.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209-05922-0

I. ①经… II. ①金… III. ①经济学—文集

IV. ①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20744号

责任编辑: 董新兴

封面设计: 李海峰

经济学家茶座(第49~52辑)合订本

金明善 主编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 (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装

规格 16开(167mm×235mm)

印 张 40

字 数 640千字 插 页 13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月第1次

ISBN 978-7-209-05922-0

定 价 5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电话: (0539)2925659

被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评为“全行业优秀畅销品种”

总第四十九辑 2010.5

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海归」的引进与使用

秦凤鸣 胡金焱等 2010年第四届中国国际金融方法国际研讨会年会侧记

李俊慧 「学历门」的经济学解释

韩朝华 经济学的显要与寂寞

李文溥 我看「中国模式论」

封 进 我们是否摆脱了「黄宗羲定律」?

蔡宏波 宋小宁 我们为什么感觉纳税痛苦?

谢明干 房子呀, 房子……

徐康宁 地理、习俗与经济发展

胡怀国 中韩图书馆二三事

史晋川 徽州的「杀猪封山」和加州的「牲畜越界」

张清津 年龄的价值

翟 华 油价「涨若放箭、跌若拉纤」的背后

宋胜洲 礼品券的是与非

聂辉华 哈特: 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哈佛教授

祝曙光 拿破仑三世与法国经济的腾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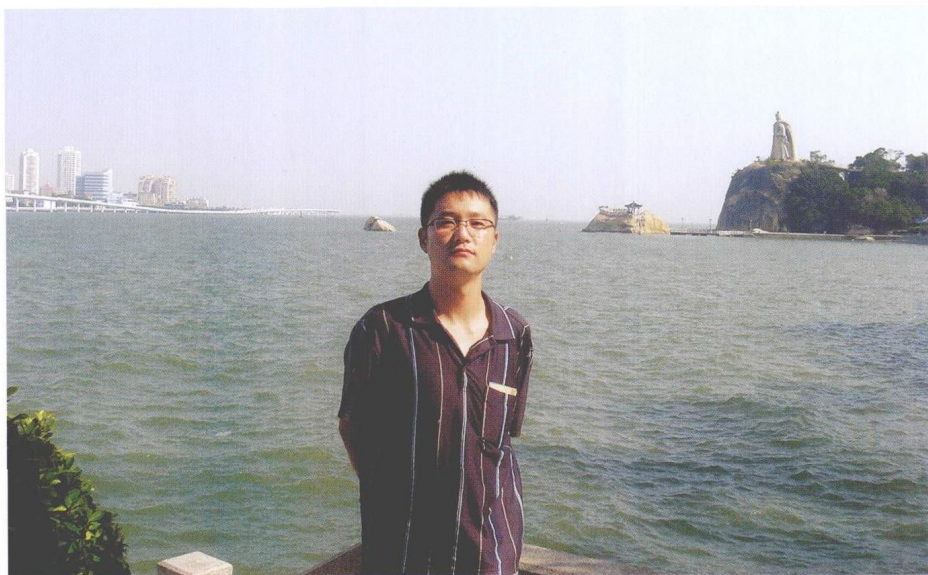
主编 金明善 特邀执行主编 詹小洪

经济学家茶座



山东人民出版社

“茶客”风采



陈钊，1973年生于浙江舟山。1991年考入复旦并于当年赴南昌陆军学院开始为期一年的军政训练。期间种过地、喂过猪、站过岗。回到复旦后与方颖、丁维莉、陆铭三位同窗创办小报《经济学人》，逐渐培养起对经济学的兴趣。硕博阶段先后师从复旦李慧中、张军两位教授，开始学习如何问问题，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着老师的为人与治学风范。200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7年蒙学校抬爱破格晋升教授。也曾访学于牛津大学、图卢兹经济学院、联合国国际发展经济学研究院等地。

从教近十年，越发体会到走进现实对于经济学研究之重要。数学可以搞得颇复杂，计量能够弄得很高深，但这一切都应当只是为了得到更为科学的研究结论而已。离开这一点，方法本身并不存在先进或落后之分别。反过来说，问题还没有整明白，复杂的技术就已经先用了，反而显得苍白无力。所以，我越来越喜欢简单而透彻的学问，越来越对那些把问题看得入木三分的“老法师”们心存敬意。于是，也就不由要感谢这个时代给予我们如此丰富的观察与体验，那是我们思考的源泉。不过，身处这样的时代，有时也难免陷于焦虑，随着不惑之年的临近，希望能够化焦虑为动力，能够借助经济学贡献一己之力。

——陈钊

文化重建VS制度创新

李仁君

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关键是什么？有经济学家说得依靠制度创新，也有经济学家说文化重建似乎更重要。此两说分歧甚大，在很多场合争论激烈。

从立论上讲，制度创新论者认为，不同国家（地区）以经济发展为主要标志的社会绩效的差异主要决定于制度的安排。他们断言，一个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不敢干坏事，而在一个差的制度安排下，好人也可能经常不干好事。因此，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关键在于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

文化重建论者针锋相对。他们认为，抽象地讲，好的制度并不难设计，制度的供给本来就是公平地存在的。可是，为什么有的国家（地区）选择了这样的制度，而没有选择另外的制度？或者说，即使选择了同样的制度，为什么就不能真正地贯彻执行？原来是根植于这个社会深处的文化传统。所以，改革要想深入推进，非文化重建不能为也。

制度创新论者开始发难，他们以南北朝鲜和东西德国说事，同一个民族相似的文化，两种结果如此悬殊，如果不能归结为不同制度使然，那又能归结为什么呢？文化重建论者从容应接，南朝鲜和当年的西德都不是简单地搬来新的制度就行了，更重要的是，不能排除他们浸淫了半个世纪左右的占领者文化的作用。

由此似乎陷入了蛋生鸡和鸡生蛋的怪圈。其实就像IS-LM模型一样，产品市场决定于收入，必须先有利率，利率由货币市场决定，而在货币市场上要决定利率，又必须先有收入。于是就有了IS-LM模型，让利率和收入同时决定。制度创新和文化重建的关系似乎也得从这方面寻找出路，二者也许并不独立，一方面广义的文化也包含制度，而制度又分正式的制度安排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要真正推进一个具有根深蒂固传统的社会实现大的变革，核心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是要伤筋动骨的，这就是文化重建的重要。文化重建了，制度也要重新安排，否则，社会就会动荡，直到二者协调为止。

希望《经济学家茶座》给制度论者和文化论者提供均等辩驳的机会。

（作者系海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经济学家茶座

第 **49** 辑
2010.5

编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松奇
王东京 王振中
王瑞璞 冯兰瑞
刘伟 刘方棫
刘国光 吴树青
汪丁丁 张卫国
杨瑞龙 林岗
项启源 钟朋荣
洪远朋 洪银兴
胡培兆 赵晓
顾海良 梁小民
黄少安 程恩富

蔡继明

主 编
金明善

特邀执行主编
詹小洪

项目负责人
董新兴

特邀执行主编助理
锥亚龙

目 录

□ 卷首语

李仁君 文化重建VS制度创新 / 001

□ 学界万象

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海归”的引进与使用 / 004
秦凤鸣 胡金焱等 2010年第四届国际金融方法国际研讨会年会侧记 / 008
李俊慧 “学历门”的经济学解释 / 029
荆林波 学者与出版社的博弈 / 033
蒲勇健 羊群效应：一种进化心理学的解释 / 036
俞炜华 论《经济学消息报》的停刊 / 041

□ 学问聊斋

韩朝华 经济学的显要与寂寞 / 043
王则柯 经济学家和教科书 / 048
陈心想 经济学的德性 / 053
柯华庆 博弈兴邦的理论基础 / 058

□ 国是我见

李文溥 我看“中国模式论” / 061
王勇 “体验”经济政策 / 066
韦森 “无为”也是个宏观政策选项 / 069
陈宪 增长要兼顾效率与公平 / 072

□ 经济评论

封进 我们是否摆脱了“黄宗羲定律”？ / 077

- 蔡宏波 宋小宁 我们为什么感觉纳税痛苦? / 080
 谢明干 房子呀, 房子…… / 085
 储小平 倪 婧 协调家族企业的“企业控制权争夺律” / 090
 周 勤 国美“黄陈之争”和职业经理人的操守 / 094
 高明华 “黄陈之争”的代价 / 097

□ 经济随笔

- 徐康宁 地理、习俗与经济发展 / 100
 胡怀国 中韩图书馆二三事 / 105
 史晋川 徽州的“杀猪封山”和加州的“牲畜越界” / 110
 刘福寿 “幸福”三论 / 113
 王永钦 伦理社会、市场社会与中间社会 / 117
 胡海鸥 西斯廷教堂冒出的烟 / 120
 卢映西 富豪、麻将和社会保障 / 123

□ 生活中的经济学

- 张清津 年龄的价值 / 126
 翟 华 油价“涨若放箭、跌若拉纤”的背后 / 130
 宋胜洲 礼品券的是与非 / 133
 杭 行 窗户税、房产税与社会福利 / 138
 董 达 资源——天下之大忧共忧 / 141

□ 经济学人

- 聂辉华 哈特：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哈佛教授 / 144
 叶 坦 凯恩斯为哪位中国人的书写过书评? / 151

□ 经济史话

- 祝曙光 拿破仑三世与法国经济的腾飞 / 15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学家茶座(第49辑)

金明善主编.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0.11

ISBN978-7-209-05544-4

I. ①经… II. ①金… III. ①经济学—文集 IV. ①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第215043号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http://www.sd-book.com.cn>

编辑部电话: (0531) 82098012

Email: chazuo4901@126.com

发行部电话: (0531) 82098027

82098028

邮购电话: (0531) 82098021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2010年11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169毫米×239毫米 16开

10印张 160千字

邮发代号: 24-180

定价: 14.00元



学界万象



“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论坛暨庆祝邹至庄教授八十华诞庆典”现场

经济学“海归”的引进与使用

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编者按：

随着我国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中国经济学教育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发展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近几年，随着大批的海外经济学子开始回国短期或长期工作，经济学教育新一轮的变化已经开始发生。在这个时候，如何更好地吸收海外经济学力量的回流，继而从整体上改变中国经济学教育水平的落后和经济学人才培养的传统模式、现有体制以适应经济发展的潮流显得至关重要。

2010年6月21日，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与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在厦门大学联合举办了“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论坛暨庆祝邹至庄教授八十华诞庆典”，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香港以及中国内地的众多经济学名家与邹至庄教授一起参加了此次盛会，大家集思广益，为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的发展建言献策，共同围绕“中国经济学教育：成就与挑战”的主题展开讨论。讨论内容涵盖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的方向与思考、邹至庄教授及其开创的颐和园经济计量学讲习班对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贡献、中国经济学教育资源分析、中国经济学教育改革体会、中国经济学研究现状及发展方向、“海归”人才对推动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的作用及本土化分析、推动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的创新思维与改革、中国经济学教育国际化进程与人才引进、现代经济学研究的内容、方法与范式等。

我们委托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的方颖教授、邓晶晶老师整理了与会的部分经济学家名家围绕着“经济学海外人才引进与使用”话题展开的发言,刊于本辑《经济学家茶座》,以飨读者,希望能为推动中国经济学教育发展开拓新的思路。编排次序以发言者姓氏的汉语拼音为序。

蔡宗武(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统计学和经济学教授、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首先,我想代表作为东道主的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在此感谢各位贵宾的到来。关于经济学海外人才的引进与使用,我想首先为各位简单地介绍一下我们特有的“WISE 模型”。什么叫做“WISE 模型”? WISE 其实是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的英文简称。它成立于2005年,是借助依托“985”^①二期平台设立的。WISE 与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有所不同,它建立的目的就是要进行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现代化和国际化,所以 WISE 从建立之初的目的和使命就非常明确。学院从成立开始,所有课程设置就都是按照北美高校的课程设置进行的,所有的课程(除了马列课外)都是用英文上课。根据国外的经验,WISE 尤其强调研究生(包括硕士生和博士生)的第一年基础课训练,也就是说,所有研究生必须在第一年修完高级宏观、高级微观、高级计量、数理经济和数理金融课程后,才能从第二年开始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和选择导师和导师组(双向选择)。这样做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研究兴趣和主动性。

在2005年 WISE 成立之初,大部分的课程主要由海外教授在海外远程主讲,如:洪永森教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利用远程视频设备在家里上课,我们学生在这边听。但从2006年开始,我们的大部分课程已由 WISE 招聘的海归教授主讲。2006年,我们开始招聘了第一批的海归回国任教。首年,我们共招收了5名海归,其中有正教授、副教授,也有刚刚毕业的博士生。截至目前,我们已经有15位海归教授在 WISE 任教,其中有一位正教授还是地道的美国人,另一位是澳大利亚裔的。当然,我们也招收了两名国内毕业的,即所谓的“土鳖”。同时,我们还有一些像萧政老师、洪永森院长、我这样的海外兼职教授,几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的兼职教授,教师队伍总人数大概是二十多个。在学生组成方面,我们的学生主要是由博士生和硕士生组成,同时还有一个本科双学位。我们的双学位是面向厦大所有的本科三年级同学招生的,强调的就是数理经济和

① “985工程”是我国政府为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而实施的重点支持国内部分高校创建的建设工程。



数理金融。双学位课程也是从第一堂课就开始用英文上课,大概一些双学位的学生在刚开始的时候会感觉有点困难,但这是一个与国际接轨的过程。我们选择澳大利亚籍的教授 Brett 和美国籍的 Jason 为同学们上一开始的基础课程,来自英文母语的国家的他们,所操持的标准英语口语对学生会有很大的帮助。

关于人才引进,我们现在非常努力引进高级职称的人员,就是副教授还有正教授。但是引进高级职称的人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比如说如果从北美引进的话,他们已经有终身制职位,但是国内没有这个终身职位制度,这是很难办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引进非中文母语的教授,这个问题黄少安院长也提到。因为我们中国所有现有的政策没有考虑到外国人在中国工作,所以所有的社会福利他们都没有,他们交了税但是都没有拿到社会福利,这就是一大堆问题的其中之一。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该如何去思考?如何去解决?有的是可以解决,但有的是(现在解决起来)很困难。刚才黄少安院长也提到了进行“斗争”,跟学校的各个职能部门斗智,所以洪老师就经常和学校的职能部门的处长进行“斗争”……其实就是应酬,所以他现在说自己就是“三陪院长”。通常,两种不同的体制摩擦会产生很多的问题。但可喜可贺的就是 WISE 成立以来我们所做的一切,特别是我们的管理理念——我们管理基本上按照北美的管理体制,尤其,对学生的管理,对教学和科研的管理。我听说学校的各个部门都在议论,在尽可能跟踪我们所做的一些,借鉴我们的经验,特别是管理方面的经验。

在教学方面,我们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比如说教授是不能随便调课的,如果要参加会议需要调课的话必须由洪院长亲自批,这是非常严的。在国内的一些经济学院或者其他学院,有时候老师随便调课,然后自己少上了点课什么的等等。但是,在我们这不一样,比如说我在上课,5点下课,洪院长经常到4点55分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看我是不是还在上课。还有一个就是课程纲要,目前国内还没有养成这个习惯,但是我们在开学之前,所有的老师都必须把课程纲要交给我们的教学秘书,这个就是按照北美的习惯。然后,教学秘书会把课程纲要挂在网上。规定是要求你上课的内容,都要按照课程纲要上面要求注明的讲,绝对不能偷工减料,这一点我们是管得很严的。

还有一个就是人才引进的问题,这是大家在谈的一个问题。这些年轻人引进来以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他们能不能在国内环境存活的问题。他们刚刚毕业,离开北美回到中国,如果没有很好的学术环境的话,对他们来讲这点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尽可能地为他们创造学术环境,尽可能地减少他们的行政事务。还有一个就是尽可能地创造一个(制度)。比如说甘犁院长提到了,他们设立了专门的基金会,利用其中的资

金邀请他们的指导老师来这里访问。我们一直就是这样做的,每学期我们有不少讲座,一个礼拜至少有一次,一个学期大概合计有20到30个。另外,WISE每年还举办多次国际高水平学术会议。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目的在于让WISE的师生有机会接触国际前沿研究和进行学术交流和合作。我们鼓励海归教员把外面的学者引进来,就是请到厦门来做演讲,其中,我们特别鼓励年轻教授跟做得比较好的教授进一步联系,不光指的是他们的指导老师,还有与他们在学术研究存在潜在合作机会的合作者们,将他们邀请过来,可以和他们一起探讨,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制度)。还有一个就是厦大有个暑期短学期,我们利用暑期短学期的机会邀请了一些海外的著名教授来给我们的研究生上课,并尽可能请一些教授让我们的年轻教授有机会和他们接触以及探讨学术研究和作,比如说邹至庄老师。邹老师现在每年到WISE上三个礼拜的课,去年春季学期我在这边上课,邹老师也在这里,我也去听了几次课。我们的牛霖琳教授跟邹老师进行合作,他们的文章也快发表了。其他像洪老师,我,还有萧老师,特别是萧老师每年也来上几次课。我们也尽可能抽出时间跟年轻人合作,比如说我跟方颖教授、跟任宇教授(的合作),跟年轻人合作就是争取帮助他们能在英文杂志上发表。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刚才甘犁院长问我的一个问题。这些海归回来以后,我们按照北美的两个任职协议,其中第二个协定就是要给副教授职称。这个标准怎么定,现在好像没有一个明确的成文规定或文件,我们也在探索这个标准怎么定。其实北美的学校也没有很明确的规定,学校的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P&T committee)有很大的决定权,我们在美国当教授也有经常在P&T committee任职的,最后这个关于提案的定夺评估战,也是很厉害的,就是根据个案具体分析,没有一个成文的规定。但是,至少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比如六年以后你要想提到副教授的话,可能要七、八篇文章,或十来篇文章,但是有两三篇要在顶尖的专业期刊上发表,这个是不成文的规定。所以我们现在引进了这么多海归回来以后,我们可能需要商量一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如何来定这个标准,至少要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或共识。

因为已经临近结束了,所以可能我不能再多说了。最后,我想说两句,就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你们可能都是经济学博士,我是在座当中唯一一个没有拿到经济学博士的人,我拿到的是统计学博士。很幸运的是1999年我去参加一个统计学会议,在交谈的时候第一次认识了洪永淼教授。那天晚上晚宴的时候又认识了邹老师。如果邹老师还记得的话,那天的晚宴的时候,邹老师做了个简短的演讲,您讲了我们经济学者怎么跟政府提建议,您当时举个例子,就是您是怎么向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提建议的,当时给了



我一个特别深的印象。我当时就想：咦？我的博士学位拿错了，我应该拿个经济学的博士学位。后来我和洪永淼老师一直都有来往，他就（建议）我转去做一些计量经济学。看了一些经济学的书后，我就慢慢对计量经济学感兴趣了。按照国内的说法就是自学成才，但是现在还没成才，呵呵，还在学习和努力。所以我很感谢洪老师和邹老师两位让我有机会接触经济学，做点计量经济学这方面的研究。好了，我就讲到这里。

甘犁（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兼经济管理研究院院长）：

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首先祝邹教授身体健康，活到160岁！我还是简单地说一下我与邹至庄项目的渊源。我出国的时候，并不是通过邹至庄项目出国的。那个时候，我在清华大学读本科。比我高的前两届的清华本科参加了邹至庄项目，其中人员包括李稻葵、李山、方星海等。到我们这一届，清华那个时候的说法是邹至庄项目影响了本科教学，所以本科就不参加了。因为本科生知道有这个项目后，就开始自己去准备英语、数学，不好好学别的课了。所以这个项目从我们这一届开始本科就没做。但是，我间接地受到了邹至庄项目的影响，因为后来李山他们从国外回来，给我们讲了国外的那些情况，然后我们就决定我们自己来，自己申请奖学金出国，所以我是邹至庄项目间接的受益者。

我今天简单地讲一下关于经济学教育改革的体会。我是四年以前受西南财经大学的委托来他们这边帮他们做项目的。这四年来，西南财经大学作为一个资源不是非常丰富的内陆高校，却引进了大量全职海归。现在经管类的全职海归超过了一百人。这在国内高校中也许不是第一，应该也是排在前两三名了。我所在的经济管理研究院是四年以前成立的，到现在为止有45位左右的全职海归，从规模上来说已经起来了。那么这几年来我和学校也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这么一大批全职海归回来到底对学校产生了什么影响？有什么样的问题？我简单说一下。好的方面，除了能够开一些以前没办法开的课程，能够发一批国际上的文章之外呢，我觉得非常好的方面是它产生的外部性。100个海归在学校中还只是占一小部分，差不多只占到十五分之一。它的外部性是指这批海归他们回来后的工作态度。学校去年在做科学发展观的工作的时候，提出了“本土适应海归，而不是海归适应本土”的说法，原因是每天半夜，那幢“海归楼”的灯总是亮着，每天到半夜两三点钟还有人在工作，学校领导是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大家都知道成都是个打麻将的地方，我们海归基本上没有人打麻将，至少在我们经管院没有一个打麻将的，这是我敢说的。所以这种工作态度在学校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这点

是我们海归在学校产生的非常重要的正面的外部性。这几年学校研究的风气和老师努力的程度都有很大的进步,所以我觉得这点非常好。

下面我讲一些这几年遇到的困难与挑战。第一个,实事求是地说,国内学者在这几年的成长是非常迅速的,通过西方范式的培养,国内学者大批地成长起来,海外博士,尤其是年轻的海外博士的比较优势减少得很快,学校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海归回来得到的薪酬比国内的要高很多,在国内博士迅速成长起来的情况下,这种薪酬矛盾是非常尖锐的。比如说,我们学校一些国内博士在海外杂志上发表论文的情况丝毫不比海归博士差,但是他们的工资要比海外博士差很多,所以就存在这种矛盾。最近我在与学校讨论海归博士的第二个协议问题时,我把全国高校的刚毕业的海外博士发表的文章作了一个不完全的统计,结果不是特别乐观。所以这就面临着刚毕业的海外博士的成长问题,我想各个高校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各个高校可以相互交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据我估计,每年从美国回国任教的经济学博士应该已经超过了100人,今年仅西南财经大学我所在的研究院就引进了17位。刚才邹先生说^①有34所国内高校在美国招聘,所以我想100人只是一个保守的估计。但这100人面临着如何成长的问题,我们也有一些相对创新的项目,比如我们允许每一个老师每年可以把自己国外的论文合作者或者导师请过来,那么学校把这个资源放出来,因为我们自己现在面临着能够真正全职回来的资深教授非常少,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够让他们及时地跟国外(联系),我希望他们由原来的导师原来的合作者继续指导他们。那么怎么办呢?只有出一些资源,你让他们自己把自己的导师请过来。因为很多老师的导师知名度不是很高,不是在国外非常高知名度的导师,他们实际上到中国的机会不是特别多。我认为我们的这个项目目前的运作还是不错的,但是仅仅这么一个项目是不够的,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在怎样培养海外老师的问题上做更多的交流。这是我今天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是即使我们每年回来100人,我们的海外老师的比较优势没有了怎么办呢?我们必须植根于中国土壤,研究中国的问题。刚才邹先生也讲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这么快,中国的问题也这么多,所以如何引导、培养海外回来的博士研究中国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那边做的方式,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把指挥棒舞起来,怎么说是没用的,对吧?那么指挥棒怎么舞呢?我们就是把国内顶尖的杂志呢,相对应于国外的B,就是比如说《经济研究》相当于国外的B(类期刊),这就导致了我们一

^① 邹至庄教授发言提到在2010年美国经济学会年会开会的时候,有34所中国大学去招聘海外毕业的博士或在海外工作的教授。



批海归老师很快地认识到存在着这个指挥棒,发国外的B很困难,发《经济研究》一样也很困难。《经济研究》做中国的问题嘛,所以把中国最顶尖的杂志跟国外的B等同起来,就导致了咱们这边一大批海外老师回来把自己的博士论文寄出去以后就开始写中国问题,思考中国问题,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事情。

下面一点是,咱们即使每年回来100人,或者150人,这在广大的国内经济学界真是沧海一粟,只是很少很少一点。刚才查卫平先生说有好几百万的学生在经济学界,好像是300万学生在经济学这一大类。有这么多学生,那我想有多少经济学的教师。我看到咱们海外回来的这一拨和国内的教师的结合不是非常紧密,我知道,也有,但是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多)。(虽然咱们人才引进)也好几年了,但毕竟还是少数,只有几分之一,甚至只有百分之一的教师是从海外归来的博士。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怎样和国内的老师接触,怎样与国内的老师合作,一起研究中国的问题是目前咱们面临的一大挑战。咱们在做,但是我自己的感受是咱们的结合不是那么紧密。所以在这点上我不知道咱们有何高见。

最后一个就是讲教材的问题,我最近在国内教的一门课,叫国际金融,我在国外也给本科生讲这门课。我在国内讲这门课的时候要讲中国的例子,从中国的角度来找教科书,至少我没有找到。国外有很多这方面的教科书,这些教科书绝大部分都是西方学者写的,都是基于西方的案例写的,即使现在最新的教科书有中国的例子也是少数。所以我在准备课程的过程中就感受到特别辛苦,主要的原因就是我需要自己发展一套思想,一套办法来讲这门课。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咱们要本土和海归老师合在一起的。说到底就是说你在中国讲经济学要用中国的例子,要以中国的案例,中国的思想。虽然你用的理论是西方的,这一点都不错,但是中国关心的重点和西方关心的重点通常是不一样的。所以希望大家讲课的过程中不是单纯地把西方的理论直接搬过来,而是要结合中国实际。就是说这么多年的经济发展应该有很多很多的,这方面的研究也不够,在讲课的时候也是感觉这方面学术界的研究也不是特别够,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

然后我再补充一点,关于经济学教育本身,咱们那边在做全英文的本科班,这个本科班从一年级进校开始全部的课程,除了马列主义之外全部是英文的。马列主义没有用德文讲,原则上应该用德文讲是吧?没有找到德文教师嘛。这个班的课程设置学校给了完全的自主性,从课程的设置,从教材的选定,包括课时,学分的判断,都是完全按照国外来做的,我要求他们上课的时候全部用英文。有的老师就说上课的时候讲笑话能不能用中文?我说讲笑话也不能用中文,他说英文笑话不好笑,我说不好笑你也得讲。你

必须让学生适应,学生是很痛苦的。其实学生开始是反对的,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呢,看起来是蛮受欢迎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尝试。我就简单地讲这两句。谢谢大家!

洪永森(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终身教授、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长江学者”讲座教授、院长):

中国现代意义的大学绝大多数都是在上个世纪成立的,而且在办学之初均按照西方大学模式兴办。特别是前半叶,中国大学的师资主体主要是由在欧美接受过系统训练的“海归”学者组成,他们在办学理念、培养模式、课程设置、研究范式与方法等方面,都不可避免地烙下西方大学对其深远影响的印记。因此,中国早期的大学,虽然规模较小(若以教职员及学生人数论,那时很多大学甚至不及今天中国大学一个院系的规模),但是,各个学科包括经济学科、商科在内,都与西方大学的模式比较接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与国际接轨。比如,现在社会科学逐渐流行的文献引用范式,其实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比较规范了。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仿照苏联教育模式对全国大学院系进行调整,这使中国大学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受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以及因不同经济制度造成的研究对象不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走上了一条与现代经济学(主要是西方经济学)截然不同的道路。这些不同具体表现在教学理念、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各个方面。众所周知,以研究市场经济为主要对象的现代经济学越来越重视并广泛使用定量分析方法,包括数学建模与计量经济学实证分析。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大学经济管理类学生基本不用学习数学课程,注重定性分析而忽视定量分析,强调经济学科的政治属性而忽视其对经济实践的理论指导意义,甚至在文献引用方面,只引用革命领袖的著作而不引用其他学者的文献。可以说,新中国建立后至上个世纪80年代前,中国经济学发展方向与现代经济学大相径庭,西方经济学说只是作为一种经济学说流派,而且是以“批判”的方式做一点介绍。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但改弦易辙后的中国经济学,在为这场轰轰烈烈的伟大经济实践提供理论指导时,显得力不从心。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化便成为一种必然的历史趋势。

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国际化进程可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以邹至庄教授为代表的老一辈经济学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尤其值得称道。进入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



的“海归”经济学者毅然回国,报效祖国,加盟中国高校,帮助推动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和国际化这一历史进程。近些年来,国家各级政府与中国高校出台了各种引进“海归”人才的法规、政策与措施,其中包括新近颁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纲要》,这些利好消息正加速“海归”经济学者回国、来华服务的步伐。与上世纪前半叶相比,当代“海归”经济学者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以在国外获得经济学博士论文为主要标准)应该说都大大超过了当时。他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所面临的任务也与早期“海归”经济学者有很大不同。比如,目前中国大学均已拥有比较完整独立的经济学教学培养体系,但是大多数与现代经济学并不接轨,或者接轨的程度较低。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海归”经济学者肩负着推动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国际化的重要责任。具体说来,当代“海归”经济学者的历史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促进中国经济学教育包括经济学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各方面规范化、现代化并与国际接轨。与此同时,“海归”经济学者也将是中国大学经济学英语教学的主力军,他们能驾轻就熟地采用英语进行教学,这将是中国大学经济学科将来吸引国外留学生来华学习交流的必要条件。

第二,促进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的现代化并与国际接轨。年轻“海归”经济学者刚刚接受过系统严谨的、具有国际前沿水平的经济学研究训练,他们以前沿的经济理论和先进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正在大大提升中国经济学的学术研水平。

第三,“海归”经济学者是中国大学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桥梁与骨干。海外教育背景使他们可以与相关领域的国际经济学者进行平等对话。而且,他们具备外语优势,熟悉国外高校管理体制、运作模式、人文文化及思维方式,并建立起广泛的国际学术联系与人脉关系……所有这些,使“海归”学者在推动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国际化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

第四,“海归”经济学者是改善、净化中国经济学目前相对浮躁的学术环境的重要推手。绝大多数的“海归”在国外受过系统严格科学的训练,具有自觉的社会良知与科学精神,这些学者的基本素质对培养中国学生,改变浮躁的学术环境具有很强的正面示范效应。

第五,“海归”经济学者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在国际主流经济学期刊发表文章,这将为提高中国经济学家在国际经济学界的学术影响力做出重要贡献。

第六,“海归”经济学者是推动中国大学各方面改革的重要力量。“海归”学者加盟